在德累斯顿听音乐会

曹景行

辞旧迎新之际，听了柏林爱乐乐团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后，第二天本来可以直飞维也纳，但我们还是要绕道好几百公里去一次德累斯顿，再从陆路横穿白雪晶莹的捷克前往奥地利。为的就是多一场美乐的享受，等着我们的正是德累斯顿交响乐团的新年音乐会。

很早很早就知道德累斯顿这个地名，知道它在德国，当时属于东德；而且从一开始就同音乐连接在一起，知道那儿有个非常棒的德累斯顿交响乐团。

2015年12月中，我在上海“大隐书局”讲了一次初中时候怎么会喜欢上欧洲古典音乐。在场有位1994年出生的女孩说：“对于一直处在应试教育压力下的我们这一代来说，社会欠我们一节音乐课……”是呵，还有美术课，音乐和美术都关系到一个人审美能力的形成，关系到终身。我们那时因为课外有很多空余时间，还有六十年代初期上海较宽松的文化艺术环境，才有可能碰触到这些音乐和其他美的东西。

我喜欢上柴可夫斯基，最早是因为芭蕾舞《天鹅湖》，舞蹈和音乐都太美了。还记得1963年11月的一个下午，刚读高一的我在九江路人民大舞台门口排队买中央芭蕾舞团的《天鹅湖》票子，四十多年后有机会与中央芭蕾舞团同台，闲聊时向团长赵汝蘅谈起这事，她说当时她是剧中的四个小天鹅之一。而我看了她们的演出，马上就到上海音乐书店，掏空口袋买了一张苏联进口的密纹《天鹅湖》唱片，不知听了多少遍，直到后来无法保存。

2002年晚春我第一次去德国，在柏林办完公事后就和妻子搭火车前往德累斯顿。中午到达，在旧火车站旁边的小旅店住下，下午就往老城方向一路逛过去，直到易北河畔。很容易就找到了闻名天下的森帕歌剧院，那儿是德累斯顿交响乐团（又称德累斯顿国立管弦乐团）的“根据地”。运气真不错，当晚就有一场音乐会。

开场前两个小时出售余票，边门前已经排起了不短的一条队伍，在我前面起码有四五十人。边门准时打开，一位中年女子从队伍头上挨个问过来：“有两张最好的位子，哪位要？”问到我们时，我和妻子对视了不到一秒钟就说“要”，保证有票最重要！

接着那女士又从排队的头上开始问价格低一点的票子有谁要，这样一遍遍问下来，最后问的是最便宜的站票，不少年轻人就等这个。

来不及回旅馆换正式一点的衣服，我们只能便装入场，其他一些外来游客也如此。但当地的听众可一点也不随便，个个都是盛装打扮，与我们对比鲜明。可见，到森帕歌剧院听一场音乐会，应该是很隆重的事情，得讲礼仪。

那场音乐会的指挥是来自荷兰的伯纳德·海廷克，七十多岁，满头白发，曲目中有马勒和布鲁克纳的交响作品。

位于德国东部的德累斯顿有易北河畔的佛罗伦萨之称，以形容其美，也形容其历史之悠久、文化积累之深厚。易北河挺长，斜穿德国到汉堡流入波罗的海。“二战”时，德累斯顿在美英盟军大规模轰炸下几乎被彻底毁灭。2002年我们第一次去德累斯顿，老城的主要街道两旁是连片工地，好多旧建筑都已恢复旧貌。曾被称为世界最美建筑之一的新教圣母大教堂，战时被炸只剩一堵残墙，那时还只重建了一半，旁边竖着顶部钟楼的模型，呼吁各方捐款。

这次再到德累斯顿，九十多米高的新圣母大教堂已于2005年正式落成，前后花了十一年时间。黄色的砂石外墙明暗斑驳，黑色的都是遭受过战火熏烤的旧料，废墟中找出来重新使用的砖石占到全部材料的四成多。不是为了省钱，而是要让后人知道曾经发生过什么。

冬日的下午太阳落山早，我们进去时正好一道斜阳穿窗而入，洒在圣像上方宏伟的管风琴上，也把整个大厅染成金色，更显神圣。重二十吨的管风琴是对“西方音乐之父”约翰·塞巴斯蒂安·巴赫的纪念，当年他作为管风琴手，就在这座教堂里多次演奏自己的作品。

与大教堂同样闻名于世的茨温格宫，可算是德累斯顿最辉煌的建筑，也同样毁于那场惨绝人寰的大轰炸，但在东德时期的1963年就重建起来。幸运的是宫殿北侧外墙和上面的102米长巨幅壁画，居然逃过了劫难。那可是世界上最长的瓷壁画，画面为萨克森王国韦廷王朝八百年中各代君主的骑马像，一共用了两万七千块手制精美陶瓷片，全都出自25公里外欧洲最有名的瓷器产地迈森。

森帕歌剧院也格外多灾多难。歌剧院以设计者、著名建筑家森帕命名，1841年完工，音乐家瓦格纳的歌剧《黎恩济》《漂泊的荷兰人》和《唐豪塞》相继在那儿首演。不幸，1869年的大火烧毁了一切。重建后的歌剧院再度毁于1945年2月盟军的大轰炸，直到1985年才又完成重建。首演之日，正是被毁四十周年的日子。重建的森帕歌剧院完全按照原貌，同百多年前一样辉煌华美。

音乐会七点钟开场，但舞台上早就有乐手在试音，陆陆续续又有更多乐手到来。提前练习预热应该是他们的传统，之前在柏林、之后在维也纳听的那几场音乐会，好些乐手也是早早到来。毋容置疑，他们都是世界顶级水平的演奏家，却还是那么认真；或许只有这样，才能一直保持最高水准吧。

担任这次德累斯顿新年音乐会指挥的克里斯蒂安·蒂勒曼有“大熊”之称，上海乐迷对他应该不会陌生，过去十年他不止一次来过中国。担任布鲁赫g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独奏的尼古拉·兹奈德2011年也到过上海。2017年2月，兹奈德会再赴上海，同行的是伦敦交响乐团，他作为小提琴家将演奏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的协奏曲。

兹奈德是生于丹麦的以色列和波兰混血儿，年过四十，有点发胖。在柏林爱乐新年音乐会上，高难度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三钢琴协奏曲的演奏者丹尼尔·特里丰诺夫，1991年在俄罗斯出生。另外，在维也纳交响乐团除夕夜的新年音乐会上，指挥贝多芬第九“合唱”交响曲的，是1982年波兰出生的克里斯托夫·欧班斯基。维也纳爱乐乐团的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，1981年委内瑞拉出生的指挥古斯塔夫·杜达梅尔已成为2017年国际乐坛热门话题人物。接连听了四场新年音乐会，我在新浪微博中留下一句感想：“这次在欧洲明显感觉到一代国际音乐新人正在冒起。”

我们搭着马车在德累斯顿老城巴洛克风格的建筑群中嘀嗒行过，很有一种穿越历史的感觉。2016年最后一个清晨，我与妻子在阳光与寒风中又一次来到老城，街头几乎空无一人，似乎让我们独享天空透明的碧蓝和易北河畔清新得发脆的空气。时间太短，好多想看的艺术馆没看，好些想去的地方没去。留给下次吧，德累斯顿的过去和今天都值得细细品尝玩味，尤其还想再听几场音乐会。

笔会

春消息

（布面重彩）

拉巴次仁

『文汇笔会』微信二维码

鸿福居

蒋韵

如今，在太原，我的城市，已经没有几个人，知道这个地方——鸿福居馄饨馆了。

几十年前，这小馆，身处在我们城市最为热闹繁华的一条街上，那街，叫“开化市街”。再早，开化市叫开化寺，是座寺院，始建于什么年代已不可考，只知道，北宋哲宗绍圣年间、元代大德年间和明正统年间都曾重修，可见其古老。据说它的鼎盛时期是在明清之际，那时，僧众沙弥无数，香客无数，寺庙旁边商贩店铺亦无数，渐渐生成集市和街巷。辛亥之后，开化寺式微乃至废弃，庙宇被开辟成“共和市场”，上世纪二十年代，更名为“开化市场”，于是，就有了周边这些街巷：开化市东街、西街、南街，等等。

鸿福居应该是坐落在开化市西街上，那是条极为狭窄拥挤的小街。第一次走进这条街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叶，那时，鸿福居馄饨馆的招牌，一块黑底金字的牌匾早已在“破四旧”时被砸毁了，改了个什么名字，忘记了。但人们仍然依旧习叫它：鸿福居。卖的仍然是馄饨、烧麦一类面食，也有几样看家炒菜。走进去，热气腾腾的一股油香，那是滋啦啦煎锅贴的贴心香气。

我从没吃过这馆子的馄饨、锅贴，更没吃过它的看家菜。去那里，原本不是为了吃饭。那时，我在我的城市东山脚下一个叫涧河滩的砖窑上做工，码砖坯，正式名称叫做“壮工”，我的一个工友，她的家就住在“鸿福居”饭店的院子里。穿过饭店不大的店堂，走进同样不大却油腻的天井，绕过煎锅贴的硕大铁炉，平地再下一截楼梯，那一条杂乱小走廊尽头的地下室里，就是我朋友的家。十几平米的一间小屋，住了他们一家四口。那头顶，恰好就是店堂的地板，白天，特别是星期天，无数双脚板汹涌地踩在这家人的头顶上，没有一刻安宁。房间没有窗子，永远开着电灯，那灯泡瓦数不大，昏黄的光明，总有一种暧昧和隐秘的气息，还有一种日暮黄昏时最容易滋生和蔓延的莫名忧伤。

那时，我朋友的梦想，她人生的追求，就是让一家人住进一间有窗户的房间，地面上的房间。一抬眼，可以看见天空，看见星月，看见市井街景和风摇树动，看见如金子般灿烂汹涌的阳光。

我朋友的名字，容我隐去，就叫她雯吧。雯是个美人。起初，雯刚到我们厂的时候，不在东山砖窑，而是在西山上采石头。那时，西山上云集了一群不得志的年轻人，雯的美艳妖娆使许多人神魂颠倒。得知美人住在鸿福居地下室里，大家扼腕叹息，给她起了个现成的外号：馄饨西施。不用说，追她的人，很多很多，众星捧月一般，可雯哪里是那么好追求的？她如同在云端上俯瞰着那些红尘中的人们。这让人反感。何况，她的嘴，十分尖酸刻薄，常常不给人留情面，冲撞了人也无知无觉，渐渐地，人就让她得罪光了。于是，馄饨西施没人叫了，直呼她馄饨馆，已然是个蔑称了，还不算，再后来，江河日下，馄饨馆变成了酸馄饨，最后，则伶仃地简化成了“老酸”。

我认识雯的时候，她已经是“老酸”了。我错过了她人生中最好的时光。涧河滩上的女人是容易衰老的，几年的野外劳作，酷暑严寒，风吹日晒，她皮肤粗糙了，头发失去了灵动的光泽，身板也宽阔了不少。可她仍然是好看的。她的好看，似乎，不在五官，也不在身材，而是在顾盼之间那一种隐秘流淌的风情和柔情，那一种坚信自己永远是美人的百折不挠的妩媚。那时，我还是个青涩的女孩儿，热爱那些美好的女人，景仰她们，觉得她们每一个都是惊心动魄的故事和秘史，而她，又正陷落在繁华落尽的那一点萧索之中，于是，水到渠成地，我们成了朋友。

夏天，我们在窑场坯行里吃饭，远离人群。烈日炎炎，河滩上无遮无拦，我们在砖坯上苫两张苇帘，下面铺上草垫，做成一个简易的闷热的窝棚。饭是各自从家里带来的便当，当然那时不这么叫，就叫饭盒。铝制的那种，也有不锈钢的。雯的饭盒里，隔三差五，会带来一些打卤面的卤，西红柿鸡蛋卤，黄花木耳肉片卤之类，满满一饭盒，香气袭人：那是鸿福居的手艺。记不得是饭店当天没有卖完的还是员工们自己做来吃的，总之，是好心的大师傅们盛到雯的饭盒里的，知道她天天带饭，也知道她干着下力气的重活。在那样的年代，这些打卤，这些西红柿这些黄花肉片，算得上是珍馐美馔了。雯总是慷慨地分一半给我，我们用它蘸馒头，就窝头，偶尔也用来拌米饭。那时白面大米都是按比例供应的，特别是大米，只在年节期间供应个一斤半斤，所以如同珍珠般珍贵。而那些卤汁浇头和大米的搭配，则是我记忆中无与伦比的美味。

我没吃过鸿福居著名的馄饨、烧麦，可我却永远记住了它善良的味道。

和鸿福居的渊源，还不止这些。

酷暑来临后，我们窑上实行包干制，凌晨五点开机，干够定量收工，为的是避开午后的酷热。厂里没有宿舍，而工人大多住在城里。从我家到河滩窑厂，骑自行车要走一个多小时，这就意味着我每天需要深夜三点多钟出发才能赶上开工的时间。适逢乱世，马路上连路灯都没剩下几盏，有各种各样打劫一类的传闻在坊间流传。怎么办？雯说，住我家吧，咱俩一起走。我说，你家怎么住得下？雯回答，你来就是，有办法。

果然，她是有办法的，和下夜的师傅打了招呼，于是，饭店后厨里的大面案，就做了我们的临时床铺。那面案，平坦、厚实，远比一张普通的单人床要宽阔。雯先在上面铺上报纸，抱来自家的被褥，收拾得妥妥当当，然后，我们并排躺下。我说，你真有办法，她苦笑着回答，什么办法？逼的。

她说，家里来了亲戚，都只能借宿后厨这张大面案。

凌晨要早起，本来，应该早早入睡，却睡不着。这样的夜晚，最适合联床夜话。雯给我讲她的身世，她的家史，还有她的恋爱史。她的出生，可谓风波不断，那是五十年代初叶，她一出生父亲就因为“历史问题”被捕入狱，没有工作的母亲只好把她送给了老家的舅舅。后来，她八岁那年，父亲出狱，母亲又强行把她抢了回来，而抚养了她八年的舅母因此发了疯……她徐徐地说，我静静地听，心里一点也不惊奇……我早就知道她是有故事的啊。她那时正在热恋之中，她的男友，潇洒，英俊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她算是一个狂热的“外貌控”。她形容她的男友，说，“好看得让人心疼。”可是，这个“好看”的男子，身世却很复杂，父亲是一个旧军官，母亲则是越南人……雯的父母激烈反对，他们本来就已经是惊弓之鸟了啊。特别是她母亲，母亲说，你要真跟了他，我也不活了，你就红事白事一块办吧。

她母亲性子很烈，说得到，做得到。

雯很痛苦。

这样漆黑的夜晚，总是被泪水浸湿。总是。

后来，我离开了砖窑，离开了涧河滩。再后来，雯也离开了。不久，就听说她结了婚，嫁了人，新郎当然不是那个“好看”的欧巴。她的婚礼，没有邀请我，只是，听人说得很刻薄，说雯找那样一个老公，怎么好意思相跟着一块儿上街？

但是这男人实现了雯的梦想——他们全家终于搬离了那间不见天日不分昼夜的地下室，搬离了嘈杂、拥挤、油烟弥漫，带给她许多伤心记忆、屈辱当然也有温暖的馄饨馆。从此她再也没有跟我联系过。

时光飞逝，转眼就到了八十年代。开化市街又一次更名为“开化寺”街。有几次，偶尔路过“鸿福居”，抬头看见了黑底金字的大匾额，才知道原来它是鸿鹄之志的“鸿”，一直以来，我都以为它是“历史洪流”的“洪”。我站在门边，朝里张望，人声嘈杂，卖的依然还是馄饨、烧麦。热气腾腾的锅贴，依然飘散着活泼自负的香气。

可我不想进去，不想吃任何一种食物。我怕它们会毁掉我记忆中属于这地方、只属于这地方的独门香味。因为，味道这东西，既坚韧又脆弱，毁掉它只在须臾之间。

人间烟火

冬天挖塘泥

李星涛

村前百米，有一穴池塘，用于平时洗衣洗菜、牲畜饮水、浇田灌溉、调蓄雨水、消防灭火等，大家亲切地称之为“当家塘”。当家塘每年都要清淤一次，挖塘泥就是冬季在当家塘里进行的清淤活儿。

俗话说得好：“人补，桂圆荔枝；稻补，紫云塘泥”。（紫云就是紫云英，是可以翻做稻田绿肥的草本植物）。每年冬天，捕完当家塘里的鱼，里面的水也会随之被抽得干干净净，只剩下一塘乌黑的淤泥等候在那里。数九寒冬的天气，塘泥被冻成块，锨铲下去，轻松自如，就像卖豆腐的打豆腐，正是挖塘泥的黄金季节。

挖塘泥是累人的活儿，但其间却充满了无限的乐趣。生产队长老杨是总指挥，他常把挖塘泥的人分成三组，一组是年轻力壮的，分配在塘底，负责用锨把塘泥甩上塘沿；二组是年纪偏大的，安排在塘沿，负责把甩上塘沿的塘泥铲进筐里；三组是半劳力，负责将整筐的塘泥抬到指定的地方晾晒。

村西头的扁头，人长得精壮，塘泥也甩得远，但他干活从不让嘴闲着。“我表嫂，我泥甩得远，尿也尿得远”。扁头的表嫂，个子虽然不高，长得却敦敦实实的。她听了扁头浪骚的话，马上丢下手中的扁担，下到塘底，拿过队长手中的铁锨，撮起半锨塘泥，一扬双臂，锨上的泥块立马像只燕子，“唰”的一声，飞过塘沿五六米，比扁头甩得远多了！扁头明知表嫂锨藏奸滑，嘴里却说：“好男不和女斗”。表嫂笑道：“小扁头，你尿得比我还低呢”！话音刚落，塘底塘沿立刻爆出了一阵欢快的笑声。

大人挖塘泥，我们做孩子的也常聚集在塘沿上，两眼灼灼放光，等候着带有泥鳅黄鳝的泥块被甩上来。扁头最大方，他挖到了泥鳅黄鳝从不自己留下，而是“日”的一声，甩到我们中间。那时候，毛孩是我们的头领，他抢到的泥鳅黄鳝最多，但并不独吞，而是将泥鳅黄鳝裹上泥巴，放进了沟底燃起的篝火里，“哔哔啵啵”地烧熟，然后小心揭掉泥鳅黄鳝身上的泥巴，一条条分给我们，吃出了一大群的黑脸包公。

挖塘泥中途要休息半小时，家乡人美其名曰：“歇歇子”。扁头精力旺盛，属于典型的“累不够”。他借着歇歇子的机会，主动向高个子大豁牙挑战摔跤。伊始，大豁牙看不上扁头，可大家你激一句，他挑一句，大豁牙便经不住怂恿。他不说话，瞄了一眼扁头，拔步走到塘沿一块空地中央，等候着扁头。

这下可热闹了！大家纷纷围聚过来，个子高的就坦然站在外圈，个子矮的就知趣地钻进里圈，塘底迟上来的，干脆就站在倒扣过来的泥筐上。我们小孩子挤不进去，马上“哧溜哧溜”地爬上塘沿边的一棵棵柳树，大雁一样伸着脖子观看。

队长老杨亲自做裁判，他一声哨响，第一跤散摔开始。大豁牙仗人高马大，臂力超群，主动进身，欲力服扁头。扁头却粘滑如泥鳅，大豁牙抓了几把都没抓住。扁头瞅住一空，双手向上一撩，大豁牙一仰脸，趁此机会，扁头迅速下蹲，两手拽住大豁牙的两脚脖子。大豁牙本能地向前一趴，想抓住扁头背后的裤带，扁头见其重心已移，两手一用力，大豁牙从他身后直直地摔翻过去，脚后跟在地上砸出两个深深的泥窝窝。

人群中一阵大笑。大豁牙不服气，要花股叉再摔一跤。所谓花股叉就是双方各有一臂从对方腋下插过，面对面搂住摔，属较力的一种摔法。大豁牙曾用此法在挖新汴河时摔倒十几条壮汉。他只要双臂用力，若对方承受不住，即双膝自然下跪。队长老杨这次没有吹哨子，而是说：“管了!”大豁牙一用力，扁头被抱起来，两脚不沾地。大豁牙轻松地转圈，扁头两脚被甩开了，芦花编成的草窝上的泥巴也被甩得纷飞。众人睁大眼睛，屏住呼吸。大豁牙转了几圈，想松手将扁头掼倒。谁知，他刚一停步，扁头却像弹簧一样弹贴过来，向上一纵身，往下一压，只听“哐当”一声，墙头一样倒下。大豁牙搂着扁头的手还未松开呢。

大豁牙败了，队长的哨子也响了。于是，大家各自回到劳动岗位，重新开始干活。与家乡挖塘泥相比，我不喜欢看姑姑家那里罱塘泥的活计，因为在整个罱泥的过程中，既没有人像扁头和表嫂那样说笑话，更没有扁头和大豁牙那样惊心动魄的摔跤比赛，而且罱泥时，小船晃晃悠悠的，人处其中，如履薄冰，时刻担惊受怕。

姑姑家住在苏州乡下，她们那地方冬天也挖塘泥。不过，她们称之为“罱河泥”。罱河泥要两人配合，一人用罱捞泥，一人用篙撑船。罱泥的工具分为两种：一种是罱泥夹，一种是罱泥耙。罱泥夹是两只像大簸箕一样的铁夹子，状如河蚌，用两根一握粗细的竹竿插入固定住。罱泥时，罱泥人双手握住竹柄，就近船帮，让泥夹沉入塘底，然后双臂用力，夹起塘泥，放进船舱。罱泥耙是用一根长竹竿固定住的铁罱耙，罱泥时奋力将其抛出。待罱耙沉入塘底，稍待片刻，轻轻拽两下，再慢慢一点一点提起来。于是，一罱子乌黑的河泥就被提上来，“哗啦啦”倒进了船舱。

1980年，我上了初中，从《科学常识》的课本中我才知道塘泥、河泥和绿肥、粪肥、灰肥一样，都是优质的有机肥。它们被挖罱出来，晒干风干后，敲碎，均匀拌上粪肥，撒进稻田，每亩可增产一百多斤稻子。另外，当家塘和姑姑家那里小河中的污泥被清理上来后，塘河来年不仅蓄水多，而且水质也很清澈，养鱼更不会“泛塘”（由于水质污染，鱼类缺氧上浮的现象）。也就在那时候，我才明白了村东头老私塾先生的话：“别人烤火我挖塘，别人车水我乘凉，不是一番寒彻骨，怎见稻花扑鼻香”。

如今，村里挖塘泥早已用上了喝泥机——真空泵，它常停泊在家乡的污水沟中，将沟里的稀污泥一口口喝起，再向田畦沟壑间持续喷射，于空中弯出了一条黑色的抛物线。冬天，我再也看不见挖塘泥情景了。怅然之余，我突然产生了另一种想法：倘若我也能像故乡的亲人一样，每年都能将自己内心堆积的尘世污泥清除掉，然后聚集下一汪清澈的时光之水，让思想的鱼儿自由游弋，那该多好啊！